

在高校专业分流过程中,什么样的标准更简单、更能体现所谓的“客观”、更能让学生“服气”,就会被采用。而不是说,什么样的标准更能体现专业选择的科学性、准确性,就会被学校采用。挑来挑去,这样的标准只剩下成绩。

专业分流,拒绝虎头蛇尾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早在半年前,通过大类招生进入上海某高校,即将升为“大二狗”的小李,就在网络上咨询专业分流的相关问题。学生层面的焦虑来自于,成绩不理想去不了心仪的专业,成绩理想又要在热门与兴趣之间挣扎。

而高校层面的焦虑则来自于另一方面。最近一则新闻,点燃了网友们的神经。衡阳南华大学2014级土木工程系采用抓阄的形式分流专业。据该校宣传部人员解释,考虑到选专业冷热不均,学院决定采用抓阄的方式分专业,但成绩排名前200位的学生可自选1次喜欢的专业。

如此儿戏的专业分流,在高校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同时也提醒人们,专业分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本是国内外通行的一项改善专业设置过窄、给学生二次理性选择专业的机制,但如何将机制用好,而不是形似神不似,国内高校仍须“补课”。

还有哪些不合理的标准

听闻“抓阄分专业”,几乎所有受访者的第一反应都是“荒唐”。

但荒唐的背后,也暴露了大类招生高校普遍的无奈。宁波大学阳明学院院长方志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专业分流其实由大类培养产生,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于人才培养新模式的观念认同,以及高校基于社会需求的专业结构优化机制。当然,学生根据自身需求和社会需求所作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会对部分专业带来一定的冲击。

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才有了抓阄分专业这一“下策”。事实上,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是隐性的。比如,参考高考成绩。

记者查看了一些国内高校的专业分流标准,其中有一类是“高考折算分+第一学年成绩折算分+综合表现”,高考成绩占权重的20%至50%不等。

小李告诉记者,如果高考折算分占40%,那么,压线通过或是仅比录取线高一些的学生,在专业分流的时候并不占优势。“综合表现的权重至多不超过10%,那么,即使这名学生在大一期间努力学习,顶多也只能拼到中等水平,在分专业时并不占优势。”

“没有被高考淘汰,努力了反而被大学淘汰。”这种“冤死”的情形,归咎于高校制定的不合理的分流标准。

基于高考成绩弊端,还有一类较为普遍的分流标准——“志愿+第一学年成绩”,即学生填报若干志愿,按第一学年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当某一专业志愿饱和时,分低者掉入第二志愿录取。

“如果学生兴趣不明,盲目从众,笼统地以总成绩作为考察标准之一,尚不足以保证专业选择的准确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说。同是文科大类,新闻侧重写作能力,哲学对批判性分析能力的要求更高。然而,专业分流的过程中,这些能力并没有加以甄别。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分流逻辑是怎么生成的

多年来,专业分流冷热不均的矛盾一直存在,但若不是此次“抓阄分专业”事件,它不会那么醒目地跳出来。

“在高校专业分流过程中,什么样的标准更简单、更能体现所谓的‘客观’、更能让学生‘服气’,就会被采用。而不是说,什么样的标准更能体现专业选择的科学性、准确性,就会被学校采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挑来挑去,这样的标准只剩下成绩。那么,为什么是高考成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加入高考成绩考虑的是一些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因不适应大学学习,或是进校后热衷校园活动,导致成绩下滑,因其学习能力已经得到高考认定,“这部分人不能不给他们机会”。

然而,这一理由并不能站得住脚。方志梅认为,高考成绩为考生选择学校、选择学校的大类提供了不同的空间和权利,进入大学后,每位学生在某个大类中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为什么是第一学年成绩?实际上,第一学年的表现代表了学生在校状态。在中外高校的专业分流问题上,考查第一学年成绩都是无可厚非的。

“在资源有限的境况下,应该给勤勤恳恳、努力学习的学生更多的选择权。”方志梅补充道。

只是单单以“志愿+第一学年成绩”的方式,尚不足以体现专业选择的准确性。实际上,一些学校尝试考查学生的“综合表现”。

方志梅坦言,由于学生活动的积极程度通常靠辅导员等人评判,主观性比较强、难以量化,评判起来对学生的说服力不足,反而会给学生分流带来不稳定因素。

因此,“志愿+第一学年成绩”的标准成为专业分流中“最稳妥”的标准。那么,我们是否要就此作出改善?改善的空间又在哪里呢?

专业分流,该如何体现“专业”

“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把四年本科教育‘一分为二’的目的是什么。”侯定凯说,高校希望学生不要因为过早定位导致知识面狭窄,从而通过大类的招生或培养使得学生延缓对专业的选择,这是将学制“一分为二”的初衷。

然而,透过上述分流标准,足见国内大部分高校对于这一初衷的考核太过潦草。

事实上,“专业分流的考核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侯定凯解释,承前,反思第一年课程有没有达到“宽口径”的效果,这一个过程可以对学生的社会活动、活跃程度等有更多期待;启后,看前一阶段的学习能否服务于专业教育,在选拔中要注重学生选择某一专业的动机、是否符合某一学科的能力要求等考查。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博士生汪

蓉向记者介绍了美国高校的一些做法。在美国,大部分学生经过通识培养之后,会在第三或第五个学期进行专业分流。其分流标准除了提供成绩单,达到最低的学分绩点之外,有的学校还设立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评估,有的学校则规定学生在前几个学期提前选修两门及以上专业课程,以此保证学生专业选择时少走弯路。

“真正建立起既能满足学生未来发展需要,又适应高校教学规律的专业选择,才是破解分流困境之道。”别敦荣说。

在国内高校,如湖北大学的专业分流采用“面试+笔试+笔试”,且不同专业要求不同学科背景的考查已经在尝试中建立。

别敦荣补充,这需要高校对学生进校后的发展持续不断地跟踪,教师、辅导员不断地跟学生探讨专业发展要求,还要具备一些技术手段,如能力测试、兴趣评估,帮助学生了解兴趣所在,建立专业认知,“技术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某些指标无法量化的问题”。

方志梅对此表示赞同。为此,她所在的高校部分专业实行了“专业准入+志愿+第一学年成绩”的做法,同时专门开发了相关软件,让专业分流在阳光下进行,保证公平、公正。

怎么关怀择优中的“落败者”

无论是专业分流设置一定的扩比,还是分数低者有且仅有更少的专业选择权,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有选拔就会有择优,有择优就有人暂时“落败”。问题是,“落败者”该怎么办?

“学生在某一专业学不下去,他自己通常是无能为力的;除非出现极端行为,学校通常也是‘见死不救’的。”别敦荣指出,高校放任学生“自生自灭”的现状令人忧虑。

凡事论成绩、排名单严重伤害了学生的个人发展,也成为学生退学、辍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侯定凯表示,进入大学,学校就应当一视同仁,承担起对所有学生的培养责任,包括那些暂时不显山露水的学生。而在现实中,每个学生初入大学都会有一段适应期,由于制度加剧了不良倾向,或是因为暂时无法适应被贴上了“我不行”的标签,对学生的伤害也将是巨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第一年的意义重大。”

为此,他建议,一年级末对学生专业选择的辅导,不该只是整体诊断,还应该有个别诊断。“这部分人的比例不高。有的人是学习能力问题,有的人是学习兴趣的问题,如果学校硬是强加专业,他有可能放弃自己。这种诊断应该交由任课教师、辅导员去跟踪进行。”

别敦荣对此表示支持。在他看来,高校可以做的还有很多,请专业人员帮助他改进学习方法,采取干预措施纠正行为偏差……“学业指导是国内高校近期亟待加强的,尤其是面向大众化教育,成绩不理想、态度不端正、方法不当者会越来越多,这都需要我们及时做好辅导”。

中国大学评论

如今的中国教育,除了“少年班”比较特殊以外,什么似乎都在推迟。幼儿园的教育方式被输送到小学,小学的教育方式被输送到中学,中学的教育方式又被输送到大学,结果是几不像。论学生心智的成熟度,除了公共关系学以外,也在推迟;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笔者所在的学科是与文化、中国传统相关的,研究生面试就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导师问:“你平时喜欢读哪一方面的书?”研究生的回答往往是:“最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妙答内涵丰富,可谓滴水不漏、包罗万象,但就是没有体现出专业精神。

这里笔者无意反对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而是说,如果真正以通识为核心,那么在中等水准之上的那部分有研究潜力的学生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要么仍然以教科书为阅读的唯对象,要么一头扎进某一个课题的具体的实验中,以技术为时尚,完全忽视整体性、科学性的存在。

但问题在于,整天抱着教科书或者课堂笔记,最终成了考研群体中的胜利者;执着于技术者,将实验报告拿到刊物上发表后也保研成功。这就让他们所遵循的“现实主义”的管理政策不仅在本校立竿见影、开花结果,而且输出经验,推而广之,成为众多大学效仿的范本。

与理想主义的“影响社会”相对应,现实主义的特点就是“顺应社会”。在以前,大学里的现实主义,主要有政策上的现实主义与行动上的现实主义两类。前者是因为无法提出真正落实现想主义的办,只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维持现状;后者则是将现实主义政策推向极致,去以敬业心和执行力来换取实际的利益。现在又衍生出了第三种“现实主义”,这就是世俗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世俗化。

前几年,厦门某大学高调开设的高尔夫课程,由于以“精英教育”相提倡而受到有识之士的诟病。其实,这类“贵族生活方式”课程的开设,内含的便是一种现实主义原则下的世俗化标准。

现在看,这种“世俗化”不仅在大学中持续发酵,而且已经脱去了“贵族”的伪装,直截了当地以世俗生活相标榜。成都某电子科技大学开设的“川菜”课即属于此类。我们相信,50名学生在食堂里一字排开,同时炒麻辣豆腐的阵仗一定会载入中国大学的发展史册,但这种“素质教育”技能化的倾向,却值得突发奇想者反思。

世俗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在向精神层面渗透。天津某大学团委牵头、学生社团开设的“恋爱课”与“川菜课”一样,又一次引起媒体的狂欢不是偶然的。人们似乎习惯了大学频现这种新、奇、特的娱乐事件,以便奔走相告,相互娱乐。

有趣的是,这门“恋爱课”虽以“素质教育”为口号,实际上却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行走。因为它有学分的要求,据说获得这些学分也可以走捷径,就是“学以敷衍”,只要找到一个恋爱对象,便可以“酌情给满分”。难道倡导者和开课团不担心这样漏洞明显的设计,会鼓励选课的学生以临时恋爱对象为幌子合法地作弊吗?

大学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转型,其基本特征自然是封闭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以食人间烟火。但不断地煽风点火,以致烟火过旺,也会把原本合理的象牙塔精神熏染得无法辨识,或者让象牙塔成为炉灶的古典背景。这一点对于应用型大学或许影响不大,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却是致命的。

当然,学生的成长在推迟,学生的现状也不容乐观,这都可以作为世俗化倾向的理由。但现实主义式的迎合,计划式的包办代替,保姆式的无微不至,对于哪怕是心智不够成熟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有欠缺的大学生也未必是合适的。

以媚俗代替知识,以娱乐取代读书,以媚俗的计划性塑造人生,反映出的是大学管理者管理理念的粗放以及本身审美水准上的缺乏。如此这般地持续进行下去,对学生来说,其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对学校而言,则只能是离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愈远,离职业培训中心的标准愈近。

现实主义世俗化的大学没有未来

■尤小立

壹月数评

超5成高校教师每学期会精疲力竭

本月,麦可思研究院发布了《腾讯-麦可思大学教师职业倦怠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高校教师在每个学期都会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精疲力竭,而且大学教师教龄越长,职业倦怠的发生频率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职业倦怠”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远非高校教师所独有。因此,对于一份职业而言,一定比例的职业倦怠率是正常的。只是比例如此之高,的确需要引起我们一定的重视。

此次调查也显示,不同职称的教师出现职业倦怠的原因也不同。但总体来说,科研和论文压力过重,以及教学量过大可以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革的是目前高校整体的科研教学评价体系,这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完成的。因此在现阶段,高校需要考虑如何能最大程度减缓教师职业倦怠的发生。

应该说,在这方面国内外其实有一些成熟经验的,比如完善学术休假制度,再比如拓宽教师在学校管理方面的参与渠道。相比较起整体的制度改革,以上这些措施实施难度并不是很大,但却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只是学校学要做出具体的行动。

中东部18所学院更名大学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不久前印发《关于2015年列入教育部专家考察的申报设置高等学校的公示》。《公示》显示,2015年列入专家考察的申报设置中东部地区本科学校36所,其中18所学院更名为大学,新设本科高校17所,合并调整高校1所。

对于“学院改大学”的现象,社会公众多以批评的声音为主,认为这是一所学校追求“大而全”的典型标志,并会举出诸如麻省理工学院等事例

作为反例。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批评声音是错误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国情下,无论是在招生方面还是在社会资源获取方面,一所“大学”都要比一所“学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其实也是如此多高校希望“升格”的重要背景因素。

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一些学院的急功近利,而且笔者也不敢排除在此次准备更名的18所学院中,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但我们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我们需要做的远不止对这些学院的口诛笔伐,而是应该尽力修正“学院”总比“大学”低一等的社会舆论,为“学院”在国内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

我国高职教育规模

首次突破1000万

同样也是教育部网站的消息,在不久前发布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专项督导报告》中,有数据显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在校生达1006.6万人,已占整个高等教育规模的40%。

正如“学院”总比“大学”低一等一样,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也不在一个层次。不久前媒体曝出的“人大毕业生‘回炉’读高职”的新闻虽然最终被证实为不实报道,但其引起的舆论关注也足以证明,目前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总体上依然存在。

在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高职教育虽然与本科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与中职教育却存在着专业设置上的同质化现象,教学内容也大量重复交叉,以至于高职教师无法完成对来自中职学校学生的教学。

与本科教育的地位落差,以及与中职教育的专业趋同,造成的是高职教育本身难以实现一个正确的身份认同。高职教育规模首破千万,又在客观上证明了目前高职教育在国内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对于高职教育更要有

明晰的认识与定位。

3000名华电新生海选开学典礼发言稿

同样也是一则关于开学典礼的新闻,只不过主角不再是校长,而是普通学生。据媒体报道,9月初华北电力大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代表新生发言的学生是在3000名新生中通过海选发言稿选拔出来的。而除了华电之外,今年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提到典礼讲话,恐怕最先让人想起的还是几年前,让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名扬天下”的那篇毕业典礼讲话。从校长到学生,几年间,讲话内容和方式的变迁,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高校正在逐渐放下身段,开拓一条更为“亲民化”的路线,这与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趋势也是相符的。

当然,高校的“亲民化”路线远远不应只是海选几篇学生发言所能涵盖的。高校放下身段,需要的是创造更多的条件,让学生们无差别地参与到学校的运行中来。这种“无差别”既包含了学业成绩的差别,也包括了学籍、专业等一系列的差别。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至少现在在大多数高校中,有资格代表学生发言的,依然是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

南大学生阅读经典

可拿2个学分

本月初,在南京大学举行2015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上,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在典礼上重点向新生推荐了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